

论道德的不确定性

艾景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基于道德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构建道德辩证唯物论和国民道德生产总值(道德GDP)说和道德不确定性指数模型;同时针对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国民道德GDP建设实施构想。

关键词:道德不确定性;道德辩证唯物论;道德指数;道德GDP;维稳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2-0056-07

一、道德不确定性与社会稳定性

道德是联结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个体行为学、群体组织行为学的总枢纽,是社会主体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指挥行为主体的方向盘。个体行为与群体组织行为的道德选择,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性。

古代的思想家一般都将道德置于核心的地位,而把政治学仅仅视为一种附庸。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城邦所追求的是美德与至善。政治先是做了道德的附庸,之后又做了神学的附庸,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逐步走向社会舞台中央。西方哲学中关于道德的理解被分为三个层面:元哲学(形而上的道德观念)、规范哲学(自主、自由等观念得以实现的规范设计)和实践哲学(实现自主、自由的道德行为)。

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每一个选择和判断,都时常面临着道德选择和道德评判问题。道德不是天生形成的,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成长环境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群体的道德是组成群体的个体道德和当时情境的叠加作用形成的,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道德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建设和培养的,道德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道德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行为主体的满意度和道德选择,而与物质产品的丰富度关联性不

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写道:“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2]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福利待遇滋生了工人的懒惰和社会福利资源的浪费这一副产品,公众道德缺失导致社会动荡频仍。这说明物质产品丰富度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围绕道德影响因素建立了道德指数模型,对道德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提出了道德GDP建设实施的“社员证”制度构想(或曰:学习劳动价值化),目的在于回答我们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后的问题,“社员证”制度可以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乱起来”的覆辙。当我们国家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之后,“社员证”制度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平起来”的可持续稳定性方案。这里“平”的含义是平稳可持续。

二、道德辩证唯物论

道德是一个极其复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

收稿日期:2020-07-26

作者简介:艾景军(1969—),男,黑龙江密山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哲学概念。道德复杂性是指对道德的分析和论述必然会牵涉到哲学其他领域的几乎所有的基本原理;道德不确定性是指评论一件事道德还是不道德,会随主客体的角度转换、外部情境、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道德主体的认知能力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论。

“道可道,非常道”^[31],按老子《道德经》的说法,“道”是一种规律,无法言明;“德”则是人们按照“道”的规律办事,是“道”在世间的体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4]5},是中国古代先贤管子关于道德的唯物论。“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极端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5]103}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道德论的基本观点。

道德还存在阶级性问题,在阶级社会,道德是分阶级的。同时道德也存在历史性问题,道德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对道德的认知与道德评判标准,随阶级不同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差异显著!

因此,道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道德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我们说道德是唯物的,是指它本质上是经济状况的产物,通常情况下,经济状况是影响道德主体进行道德选择的主要因素;我们说道德又是辩证的,是指道德会随着道德主客体之间的阶级关系、历史背景、教育背景、先前经历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候非经济因素又要远远超越经济因素的影响。

道德辩证唯物论还体现在道德状况从根本上是由所有制、分配和经济调节等经济制度或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其次是社会及家庭的培养和教育。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所有制、按需分配和计划经济,人们的道德觉悟就必然有质的飞跃,产生良德框架;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及其按资分配会产生私有道德框架,少有良德,私有制是所谓“人心坏了”或“人性本贪”的社会制度性根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产生以公为主、公私结合的次良德框架。因此,努力实现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经济制度能够完美的匹配,是我们现阶段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道德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构建社会道德体系,必须以经济激励为基础,结合教育手段,二者缺一不可。仅仅指望空洞的说教达到教化民众的想法,不符合唯物史观,而单靠无原则地派发福利来讨好民众,则是治理水平低下的表现。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说:“人都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做样、虚情假意,危险则唯恐避之而不及,逐利却不甘人后;你对他们恩惠有加的那段时间,他们似乎对你全心全意,并且在那段时间表示愿意为你献出自己的鲜血、财产、生命甚至儿子都可以奉献给你,一旦你有了这种需要,他们却转身而去,连头也不回。”^{[6]65}坚持道德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统筹安排、指导我们国家应对生产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是本文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

三、道德不确定性模型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人类道德生活异常复杂,行为主体依据某一个或某些道德准则实施自己的行为时,往往是在准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进行的并产生道德冲突,在道德冲突下作出的道德选择,受到当时情境的影响,也和道德主体的经济状况、教育背景、过往经历以及和道德客体关系等诸多因素有关,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道德既然是唯物的,就是可以量化的,可以量化的,就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道德又是辩证的,道德的模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模型。我们用道德指数来概括这个模型,在定义道德指数之前,先对影响道德指数主要的相关因素做定性、定量阐述。

(一) 道德不确定性影响因素

1. 道德主体

是指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单位,甚至可以大到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社会;还可能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事件。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行为主体既可以是道德主体也可能是道德客体。道德主体与客体的转化,体现了道德的阶级性。

对于同一个道德客体可以有不同的道德主体,因客体或观察者的观察视野和观察者角度的不同而不同。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可以怪罪于直接对他实施迫害的人,也可以怪罪于这个社会或这个时代。道德主体的教育背景,也

对道德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狂热的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一定会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观。道德主体的过往经历,也对道德选择有重要的影响。

2. 道德客体

是指行为的作用对象,与道德主体相对应,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单位,甚至可以大到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社会;并且也可能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事件。客体和主体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行为主体既可以是道德客体也可能是道德主体。

对于同一个道德主体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客体,因主体或观察者的观察视野和观察者角度的不同而不同。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就会有不同的道德评判。道德客体的自身表现,严重影响着道德主体的决策,如果道德主体对客体严重失望,甚至是厌恶乃至痛恨,就直接决定了道德主体的行动方向,这里面也包含了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之间的关系,好的关系如亲如手足、情同父子、相濡以沫等;不好的关系如相互嫉妒、相互排挤、有我没你、不共戴天、恨之入骨等。

3. 正义

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正义的道德标准一般是公序良俗,通常是正确的事情,或符合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具有公正、公平、善良、良心等特征。正义通常具有公认性,不会随着主体、客体及观察者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有时为了总体或长远的利益,会牺牲局部或暂时的道德,比如:小不忍则乱大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诱之善而非谎也,等等。一项社会政策的制定初心和本意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当然,正义因素对道德指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事件本身,也存在于道德主体自己的主观判断,在模型中,将这部分影响归于主体认知因素里面。

4. 道德情境

又叫道德场景或道德环境,是进行道德选择时所处的时间、条件和地点等外部环境因素。“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7]142}是道德情景最典型、最生动的例子。

四月美在花开,也美在花落。桃花杏花已经飘落,月季正当时。有人抡起扫帚打花很显然是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如果考虑到道德情境因素,

河南郑州环卫工人“抡扫帚打花”的一幕就不难理解了。据环卫工人们反馈,如果有花落在地上,被检查人员发现后,环卫工人就会被罚款,环卫工人存在“以克论净”的考核标准,落花虽美,但是对于这些环卫工人来说,却是扣工资的“万恶之源”。“辣手摧花”的虽是他们,但是背后“以克论净”的考核制度才是问题的根源。因此,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人。

5. 道德收益

道德行为后果带来的利益占道德主体既得利益的百分比。这里的利益通常指资产,它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做特别说明,以下提到资产,均指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又叫净资产,是指道德主体的主要经济收入和积累的财产;无形资产主要包括道德主体的名望、信用、品牌、客户资源、渠道资源、人脉资源、荣誉、网络粉丝量、网络日活数、获得夸赞、个人形象、美誉度、社会身份地位等。

道德收益体现了道德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精彩的引述:“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8]839}

从道德收益的角度看,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可以放心依靠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少的可怜,所以相对应的道德收益就比较大。

6. 道德成本

道德行为后果造成的利益损失占道德主体既得利益的百分比。这里的利益也是具体为资产,含义与前面的道德收益相同。

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存在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个潜在的价格,即所谓“道德成本”。非法活动与合法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收益一般都比较大大,同时成本也更高。在道德监督不充分与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不道德的或非法活动的收益往往与其付出的道德成本则是反比的,违法获得的是暴利,但是受到的法律与道德惩罚却十分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假冒伪劣”“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网络诈骗”等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法律监管制度的完善,这种现象也渐趋减少,这表明从道

德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失衡都只是暂时的,平衡才是常态。越是充分发达和成熟的法治社会,道德收益和道德成本越是趋于平衡。因此,新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将会被从根本上遏制,网络营商环境也会逐渐得到好转。

7. 道德监督

道德行为发生时是否受到监督。监督是影响道德选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表现在交通管制方面体现的特别突出,一个交通路口如果没有摄像头,司机对于直行和转弯灯标记线大都不会去严格遵守,如果有了摄像头,即便是该摄像头遭到损坏不能工作,过往司机也会严格按照标记线规定驾驶。而官员的贪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监督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年为何一直搞不好,除了存在经理人管理能力问题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监管者总是给自己留下了监守自盗的后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权威而又科学的论断,指明了道德监督的路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教育广大干部“不想腐”,是为了提高主体的道德觉悟,“不能腐”的法律制度体系是道德监督的外部因素。

(二) 道德指数模型

又叫友好指数,是指道德行为主体面临道德选择或道德冲突时,对待客体的友好程度,是主体对客体提供帮助或采取敌对行为而愿意付出的努力程度(用付出相应资产的比例表示)。用道德的英文单词 moral 的首字母 m 表示。

很显然, m 的值域是 $[-1, 1]$, 当且:

当 $m = -1$ 时,表示主体与客体有不共戴天之仇,愿意为迫害客体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所有资产(有形资产加无形资产,以下同)乃至生命;

$m \in (-1, 0)$,表示主体对客体是敌对的,愿意为损害客体而不惜付出自己相应比例的资产;

当 $m = 0$ 时,表示主体对客体既不友好也不敌对,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立态度;

当 $m \in (0, 1)$ 时,表示主体对客体是友好的,愿意为帮助客体而不惜付出自己相应比例的资产;

当 $m = 1$ 时,表示主体对客体无条件的友好,愿意为帮助客体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所有资产乃至生命;

道德指数计算方法:

$$m = \sum_i^n \text{factor}(i)$$

其中: $i=1, 2, 3 \dots, n$ 表示有 n 种影响因素,模型本身是开放性的,可以增加影响因素,本文只建立了包含主体、客体、正义、情境、收益、成本、监督等 7 个因素模型。

$\text{factor}(i)$ 表示某个影响因素的取值,取值范围是 $[-1, 1]$,取值方法依据对待客体的友好(取值为正数)或敌对(取值为负数)程度,在 $[-1, 1]$ 区间按百分比取相应的小数,表示主体愿意付出或动用所拥有资产的比例或者参与概率,对于历史人物评价可以被认为是对被评价客体的得分;

m 的值域是 $[-1, 1]$,即使计算结果有可能大于 1 或小于 -1,本模型也只做 $[-1, 1]$ 的道德决策选择,表示付出生命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能承受的道德成本最高限。

(三) 模型应用示例

从道德观察者角度,对道德的主体和客体行为的正义性作出判断,采用道德指数模型进行分析,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大相径庭,就是通常所说的阶级立场决定论。下面我们用道德指数模型,就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疫情案例进行道德评判分析。

道德事件:在疫情早期,中国的武汉首先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西方媒体报道认为这是共产党专政下国家治理体制的失败。

道德分析:

道德主体:西方媒体,老板到员工们受到的教育背景就是要反华的,过往的经历也是反华,所以这项取值为 -0.9 甚至 -1,姑且取值为 -0.9;

道德客体:中国政府为客体,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应该会有一些,但是了解不多,姑且占 0.2 分数,由于阶级立场决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是必须要仇视的,占 -0.9 分数。所以因素综合分数 -0.7;

正义性:国际关系中基本无正义性可言,只有利益性,这项取值为零。

道德情境:当时的情景是中国也确实发生了早期疫情防控不利的状况,尽管事态发展还不甚明朗,但总体方向判断还是要有的,这项取值为 -0.6;

道德收益:这是他们的职业,此项应该取 -1;

道德成本:如果他们还对中国政府心存畏惧的话,此项可以取 0.3;

道德监督:媒体是行使社会监督的,本身不怎么受到监督,可以不必考虑,这项取值为零。

道德指数 $m = -0.9 + (-0.7) + 0 + (-0.6) + (-1) + 0.3 + 0 = -2.9$ 取值-1

因此,西方媒体必须不遗余力地诋毁和抹黑中国政府,站在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只有这样做才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四、国民道德生产总值

(一)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

“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4]5},是说老百姓如果能够丰衣足食,就会民风淳朴,安居乐业。为祸作乱的流民、暴民就不会出现,这当然是统治者最想要的状况。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让老百姓都能够“仓廩实”而有道德?

这就必须要坚持走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老百姓富裕了,才能有好的道德素养。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一旦私有经济的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率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引起失业率增长、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等一连串不良的经济现象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稳定状况,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结构不是好的道德框架。

所有权决定事权,财富资源如果不掌握在政府手中,拿什么来做贫富调剂。只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家才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为人民谋福利,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资本主义道路奉行的是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产权神话”和市场自由化,反对公有制和国家干预。事实上,由于“马太效应”,自由交易的结果就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老子《道德经》通篇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老子自己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也承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3]150}。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使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生产相对过剩,工人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悬殊。

(二)国民道德 GDP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 GDP 增长,就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是我们忘记初心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我们应当摆脱增长的焦虑,国家的重大投入,不应该仅仅关注于硬件设施的投入,更应该向道德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软件方面倾斜。以钢筋水泥为代表的硬件基础设施属于第一轮,以信息网络建设为代表的属于第二轮,以道德建设投资为代表的应属于第三轮基础建设。

道德建设的投入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它产生的效益是通过国家长治久安来体现的,也应该纳入到国家基础建设范畴。如果道德水平跟不上,再好的经济建设成果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实践证明都是一场徒劳,是循环往复的“西西弗斯”困境!我们绝不能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

为此,笔者提出国民道德生产总值,即道德 GDP 的概念。基本含义是:国家每年通过经济投入和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国民道德觉悟水平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每个公民作为道德主体,以国家的发展建设事业为道德客体,每个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道德指数乘以其本人可支配的本年度创造的 GDP 累加总和。这里需要说明三种情况:道德主体创造的其本人可支配 GDP 再高,如果道德指数为负数,不利于社会和国家发展,说明政府的社会治理是失败的;另一方面,道德主体创造的其本人可支配 GDP 为负数,即便道德指数为正,对于社会也是不利的,说明政府的社会治理也算不上成功。第三,道德主体创造的其本人可支配 GDP 为负数,道德指数也为负数,这时道德 GDP 应取负值,表示对于社会发展是更加的不利。

理论上讲,道德 GDP 可能等于或小于 GDP,甚至有可能是零或负数。当一个国家的道德 GDP 为零或负数,标志着该国政府的执政威信已经丧失了。至此,国民道德 GDP 可以看成是一个政权的健康指数,可以通过民调的方法和途径,经过科学周密的测算得出。

科学的发展不仅要追求普通意义上的 GDP 增长,更要注重道德 GDP 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要想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必须要具备双 GDP 指标。做到同时增长,社会才算是真正的科学发展,社会才能更加稳定,文明富强程度也会更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才会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五、如何获得道德 GDP 的增长

(一) 允许一部人分先“赋”起来

追求效率最大化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条基本规律。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工业智能机器人在生产领域应用的日益广泛,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得到解放,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离开一线操作岗位的工人只能越来越多。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存在生产过剩问题,生产过剩的最大难题是“赋余”工人的安置问题。

美国的职业银行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以及北欧福利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都养了一帮懒汉,而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必须吸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要让下岗失业人员明白一个道理,社保福利绝不是政府的恩赐,政府有保护他的义务而没有养活他的义务,他们的每一分收入都是自己奋斗得来的。

(二) 国民道德 GDP 建设实施构想

道德 GDP 建设需要通过经济学的手段,给收入没有确定性保障的民众一个确定性的经济保障,借经济保障之力对民众实施道德教育,才能最有效地提高道德水准。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由于目前失业保险金领取的限时性,无法提供赋闲人员长期生活保障,领取失业保险金人群的限制性,也无法覆盖全部赋闲人员;目前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也还属于临时型和拾遗补缺型,而不是普遍常态型。因此,在将来大量下岗赋闲人员出现之时,预计城乡社保一体化政策并轨已经完成,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中,也必然要增加社会失业福利津贴项。在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以在岗平均工资水平的20%、40%和60%,分别作为初级福利津贴、中级福利津贴和高级福利津贴待遇进行发放较为科学。

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原则上不需要统一考试,由基层村党支部或社区组织实施,申请者只需要进行一定课时量的理论学习即可。

初级福利津贴、中级福利津贴和高级福利津贴待遇的发放,必须经过统一严格的闭卷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统一而严格的闭卷考试,是体现公平的最好办法。考试通过发给“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员证书(初级、中级、高级)”,简称“社员证”,初级证书有效期8年,中级证书有效期4年,高级证书有效期2年。凭“社员证”领取社会福利津贴。

考试资格人群、考试通过率等依据国家或地方财政能力,适当进行调整。早期可以先在个别省份搞试点,或者先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试行,待模式探索成熟后,根据财政负担能力,逐步扩大人群。“社员证”制度赋予福利制度的弹性优势,可以实现预算硬约束。而目前西方国家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是预算的软约束和制度的刚性之间矛盾的出现,导致政府福利支出只涨不降,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一旦福利发放跟不上,工人就上街游行、打砸抢烧,呈现“乱起来”的状态。

考试内容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思政科目为主,也可以适当设置少量实用工作技能类科目,可以根据社会就业需求状况适当调整。学习内容自然以考试内容为指挥棒。

学习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可以线下集中统一教学,也可以依托各种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分布式网络教学;可以在现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村民市民学校里进行,也可以依托目前现有的教育资源;可以重新建设学校,也可以利用闲置的一些教育资源;当然,符合资质要求的社会培训机构也可以参与进来。

六、结语

对历史人物、事件或当前热点人物、事件的道德评价,仅仅是表明态度和立场或进行道德谴责没有意义,感慨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更是于事无补。用道德指数模型进行道德分析,能够推测出道德主体的行为动向;通过换位思考,以自身作为道德主体,计算出道德指数,可以指导下一步的应对措施。这正是道德指数模型的实用价值所在。

宗教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借助神的权威,宣示其教义。作为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可以借助于公平的力量来宣示高尚的道德价值观。考试是目前相对最能体现公平的手段。通过学习和考试锚定待遇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在执行的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9]103}道

德建设需要利益驱动机制。科举制的成功,在于寓学于利,个人实现了学习劳动价值化。在未来人工智能社会,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可以获得报偿。严格的考试制度,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能体现公平的筛选机制。

道德 GDP 的新尝试,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创新性制度安排,没有现成的成功案例可以借鉴,在实施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为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副产品。

按照国际经验,一国失业率不超过 7%—10% 为宜,否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考试这一公平的选拔机制,作为“赋闲”人员福利待遇分配依据,并且提升了这部分赋闲人员的思想道德觉悟,消除了社会不安定隐患,就打破了失业率不得超越 10% 的魔咒,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超越!

参考文献:

- [1] 孔子. 论语[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3] 老子. 道德经[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4] 管子. 管子[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M].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
- [7] 韩非. 韩非子[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8]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On Moral Uncertainty

AI Jingjun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oral uncertainty, we can construct moral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theory of national mor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moral GDP), and the index model of moral uncertainty according to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existing issue of overproduction in socialism, in order to avoi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conception of socialist national moral GDP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oral uncertainty; moral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oral index; moral GDP; stability maintenance

(责任编辑 雪箫)